

ПОВЕСТЬ О ЖИЗНИ
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



一生的故事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4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生的故事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4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 生 的 故 事

第 四 部

■ 第一部 遥远的岁月

■ 第二部 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

■ 第三部 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

■ 第四部 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

■ 第五部 投向南方

■ 第六部 漫游的书

■ 责任编辑\孟保青 高树海
■ 装帧设计\慈立群

目 录

第四部 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

奥斯塔普·边杰尔的祖先	1
胶合板迷宫	24
大麦粥	29
封锁	34
情况的阴谋诡计	47
“和平起义日”	52
奥地利海滨浴场	66
甘油肥皂	72
劈家具	85
麻布证件	101
被偷走的讲话	116
纯属虚构的画家科斯坦季之死	122
“您想要什么,年轻人?”	133
“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有莫泊桑”	145
“那个”男孩子	160



第四部 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

苦役般的工作.....	169
近的和远的.....	180
为了高尚目的的闹剧.....	189
缓慢的时间.....	201
十一级.....	238
塔夫里达的卫城.....	256
深夜.....	269

第四部 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

奥斯塔普·边杰尔的祖先

一九二〇年二月里的一天，刺骨的北风呼啸着，邓尼金匪军最后向城市打了几发榴霰弹，逃离了敖德萨。炮弹在空中爆炸，发出微弱的响声。

白匪军逃走后留下了一座备受蹂躏的城市。风把一堆堆烧焦的纸和油迹斑斑的邓尼金伪钞吹集到水落管旁。人们就这样随便地把这些钞票扔掉了。用这些伪钞连一个齐墩果也买不到。商店都关了门。隔着窗户可以看到，一群群褐鼠匆匆忙忙在积满灰尘的柜台上乱翻乱刨。一个个集市广场——普里沃济、托尔奇基和巴拉霍尔基全都变成了铺着鹅卵石的荒地。只有一些饿猫，饿得摇摇晃晃，迟疑不决地从这些广场上跑过去，想要寻找一点吃剩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在敖德萨根本就没有任何吃剩的东西。

可怜的一点儿剩余食物转瞬间就消失了。一想到在这座荒

凉的港口大城市里，除了带点儿锈味的自来水，什么也弄不到，心里就不由得一阵阵发冷。不知是由于什么奇迹，自来水设备还从德涅斯特河里抽送来一股很细的这样的水流。

那时候我住在敖德萨黑海街上兰杰斯曼医生的一所空着的疗养院里。

还有几个记者和我一起住在疗养院里。其中有一位彼得格勒的记者亚沙·利甫希茨，这是一个精力过于充沛的人，除了政治和报纸工作，他对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在我上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个未知的时代的开始》中，我已经谈到过他。

苏维埃军队到来之前不久，亚沙对我说，得从兰杰斯曼的疗养院里搬出去，因为布尔什维克进入敖德萨以后，就会把疗养院收归国有，反正要把我们赶出去。

“可能发生很不愉快的事！”亚沙用宿命的语气说。

他没有说明到底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因为那时候预料到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是人们常有的一种心情，所以我也没问他。

我和亚沙在疗养院附近向一个善于趁机谋利的房东租了一间管院子的人住的房子，房东是个免去教职的神父，姓普罗斯维尔尼亚克。

管院子的人住的房子座落在一座荒芜的花园里，花园四周围着高高的围墙，围墙是用一种叫做“砂岩”的石头砌成的。临街的那一边有一幢两层楼房保护着这间管院子的人的住房。在那个不太平的时期，住在这间管院子的人的住房里，就像住在堡垒里一样，使人感到放心。无怪乎普罗斯维尔尼亚克本人把这间管院子的人的住房叫做“基度山堡垒”哩。

在我们住到这儿来以前，普罗斯维尔尼亚克曾把管院子的人住的那间房子租给新俄罗斯大学一个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

授、俄罗斯化的德国人施韦塔乌。教授把这间房子改造得好像一所独门独户的、舒适的小住宅，住宅周围全是种着雏菊的花坛，还把他自己的藏书搬到了管院子的人的住房里，但不久预感到危险时期已经临近，于是扔下一切，跑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教授的藏书几乎全都是德文经济学著作，这些书放得那么整齐，好像连一次也没有人碰过它们。而且这些书都是用哥特字体印刷的，因此在我看来，它们似乎枯燥异常。

这些书散发出一股很浓的来苏气味和调料丁香味。从那以后，对于我来说，这种气味就成了似乎令人感到苦涩的、烦闷的象征，特别是调料丁香——这种黑色的、像小泡钉一样的、热带植物种子的气味。

但教授的藏书中有全套八十六卷的《布罗克豪斯—艾弗隆百科全书》^①。这是令人羡慕的宝贵资产。

我住在施韦塔乌留下的这些书籍和东西中间，虽然没见过这位教授的面，却已经想像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当然对自己很满意，总是洗得干干净净，面色红润，留着一撮淡褐色的小胡子，戴着金丝眼镜，眼睛里有一种老童男所特有的空虚的闪光。我想像中的、在我以前住在这里的这个人的形象使我感到不快。因此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就把窗子全都敞开，以便把这种规规矩矩的教授气味从管院子的人的住房里吹出去。

在转而叙述今后的事情以前，得先用几句话来谈谈黑海街。我爱上了这条郊区的小街，深信它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条街道。

从城里通往黑海街的道路本身仿佛就是一种能医治一切不

① 布罗克豪斯和艾弗隆股份公司出版的百科全书是十月革命前俄国最早的百科全书。——译者

幸的药物。我经常有这种体会。有时由于受到什么挫折，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心情十分沮丧。但是只要我一走进黑海街四周那些荒凉无人的小巷——天文台小巷、斯图尔扎小巷或炮垒小巷，——听到老洋槐树沙沙的响声，看到冬天金色的太阳照耀着围墙上发黑的常春藤，脸上感觉到吹来的海风，于是立刻就会恢复平静和轻松的心情。

这些小巷全都是由围墙构成的。房屋藏在花园深处，躲在偏僻的便门后面。这些小巷都通往黑海街。黑海街延伸在俯临大海的、高高的陡岸的边缘上。“延伸”一词用在这里未必合适，因为这条街并不长。几分钟就可以穿过这条街。

从黑海街上可以看到大海——在任何天气里海都是极美的。左下方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兰热隆和卡兰金港，那条被狂风骇浪磨光的旧防波堤就是从港口那里蜿蜒曲折，伸向大海的。右边是红褐色的陡岸，上面长满滨藜和落满尘土的灰菜，陡岸一直通往阿尔卡季和大小喷泉，通往烟雾弥漫的海滨浴场，大海时常把挣脱锚链的浮动水雷冲到海滨浴场上来。

黑海街是敖德萨的海上前哨。进港和出港的轮船都要从它旁边经过。黑海街上花园里的呼啸声能表示出各种不同的风力。我们学会了根据这些呼啸声判断风力，就像海员根据蒲福风级判断风力有几级一样。

还有一些别的声音，甚至是一些无关重要的声音，但它们也能把天气情况告诉我们。例如，成熟的栗子落到人行道上的频繁响声，说明风力正在加强，达到了四级。

黑海街上总是荒凉无人。不多的居民宁愿待在家里。因此，黑海街上有一次出现了一个赶着一匹弩马的、黑脸的卖炭人，这简直被当成了一件离奇的事。这首先是因为，当时木炭的

价钱像金子一样贵。还因为那个卖炭人居然大胆说穿他所卖的是什么东西，用仿佛毛茸茸的、阴郁的声音喊出那两个亲切的字来。

“哎，木炭，木炭啊，卖木炭啊！”

在那些日子并不舒适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被生活的风暴抛到黑海街上来的人们来说，黑海街好像是一个虽说靠不住、但毕竟可以“救命的孤岛”。

那时候伊利亚·阿诺尔多维奇·伊利夫^①还不是作家，而是穿着破旧的衣服，扛着一把高凳梯子，在敖德萨走街串巷，给人修电灯。伊利夫肩上扛着这把高凳梯子，很像安徒生童话中又高又瘦的扫烟囱的人。

伊利夫是个电工，干活儿慢腾腾的。伊利夫站在高凳梯子上，夹鼻眼镜上的镜片不时发出微弱的闪光，他敏锐地注视着脚下吵吵嚷嚷的住宅和机关里所发生的一切。

显然，伊利夫看到了许多好笑的事情，因为他总是在暗自发笑，不过什么也不说。

有几十个奥斯塔普·边杰尔，暂时还没写出来、还没被揭露出来的奥斯塔普·边杰尔摇摇摆摆地从伊利夫身边慢慢走过去。他们并不特别注意伊利夫，只是有时说几句俏皮话，嘲笑他那副知识分子的夹鼻眼镜和那条提得很高的裤子。有时他们还是会问他，要不要焊铁用的盐酸（那时候自然界里早就已经没有盐酸了），或者是要不要从犹太教堂里剪下来的三米电线。

遇到这种情况，伊利夫会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而这仅仅是

^① 伊·阿·伊利夫(1897—1937)，苏联作家。曾与叶·彼得罗夫(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1903—1942)合作进行创作。

为了听到一连串敦德萨最新的俏皮话、誓言和骂街的话。

流行的誓言经常更换，这取决于许多事物，取决于国内战争前线上的情况，取决于英国的“壮丽”号主力舰是不是停泊在君士坦丁堡，要么是取决于波罗的海水兵队的举止，据说这支水兵队借住在磨坊主魏因施泰因的家里。

当时最时髦的誓言是：“叫我走不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这句誓言中含有明显的暗示——在敦德萨街道上走路是危险的。

但是伊利夫修电灯的时间并不长。不久敦德萨发电厂便停止发电，敦德萨人断言，它永远停工了。

我所以想起伊利夫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大胆的骗子奥斯塔普·边杰尔——是因为，即使在那些严酷的日子里，诈骗行为在敦德萨也十分活跃。就连意志最薄弱的人也沾染上了诈骗习气。他们也开始相信旧货摊上的一条古老的规律：“要想有饭吃，就得在旧货市场上卖掉背心上的袖子。”^①

诈骗行为最后竟钻进了我们文学工作者和记者们的圈子。

苏维埃政权的货币，我和亚沙·利甫希茨连一戈比都没有。只剩下够吃一天的咸刀鱼。写字台上扔着两块黑面包干。黑面包干也像教授的藏书一样，散发出同样令人厌恶的来苏味和调料丁香味。

应当采取个什么办法，免得由于虚弱而饿死。但好像故意与人为难似的，头脑里是空的，只是在嗡嗡地响，无论是我，还是亚沙，都想不出任何主意。而且，在一个还既没有机关、没有报纸、没有市场，又没有苏维埃政权的货币、已被洗劫一空的城市里，能想出什么主意来呢？只好等待一切都走上正轨，可是等待

① 背心没有袖子，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做不可能做的事。——译者



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饿得摇摇晃晃，感到恶心了。

因此我们宁愿用自己的旧大衣蒙起头来，躺在管院子的人的房子里，还是在等待着，不过不知是在等待什么。

管院子的人住的那间房子像冰窖里一样冷，屋里仿佛有一层厚厚的寒气。我们用旧报纸生起“小铁炉子”，很快就把炉子烧得通红。但是它也很快就又冷却下来，和烧旺起来同样迅速。

在苏维埃军队占领敖德萨以后的第五天，我在基辅的一个同学沃洛佳·戈洛夫钦涅尔来找我们了。在这以前两星期，我在杰里巴索夫大街上碰到了他，尽管他眼睛近视得厉害，戴着金丝眼镜，神情萎靡不振，但看上去还是一副老爷派头，他正在沿街叫卖打火机。

沃洛佳领来了一个满脸皱纹、像猴子那样矮小的人，这个人说话说得很快，含糊不清，似乎嘴里含着满满的小石子。

“喏，”沃洛佳·戈洛夫钦涅尔说，说着模棱两可地指了指那个矮子，“我荣幸地向你们介绍托列利同志——这是笔名。而在‘尘世上’，这是用你们那位免去教职的房东的说法，他姓布柳姆基斯。他是敖德萨的记者。他有一个主意。”

我们从大衣下伸出头来，默默地仔细打量那位正在抱歉地微笑、而且有个什么主意的托列利同志。

“是托列利，还是托里切利？”亚沙吹毛求疵地问。他稍有点儿耳聋。

“托列利，”沃洛佳·戈洛夫钦涅尔没精打采地又说了一遍。“不过这并不重要。他的主意与你们十分困难的生活有关系。我所说的这位托列利同志——在尘世上是布柳姆基斯——处境也十分困难，和你们两位一样，甚至也和我弗拉基米尔·戈洛夫钦涅尔，基辅一位教授和口腔科医生的儿子，游泳冠军的处境完

全相同。这个主意由托列利同志自己来说明，因为他的语言能力是允许他这么做的。”

沃洛佳喜欢用胡闹似的语言说话。还在中学里的时候，我对此就已经习惯了。

于是托列利说了一通，但是说得那么快，我们只听到一些嗒嗒的响声，就好像有人在敲土耳其鼓，鼓点声声，密如骤雨。

“对不起，我来翻译，”沃洛佳·戈洛夫钦涅尔毫无热情地说。“托列利同志认为，应当立刻、而且尽可能一本正经地采纳他的主意。”

原来托列利同志向免去教职的神父普罗斯维尔尼亚克租了一间房子，就在朝街的那幢两层楼房里面。他从免去教职的神父那儿获悉我们是首都的记者。托列利羡慕首都的记者，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用敖德萨来交换即使是在《俄罗斯言论报》的工作。你们会问：为什么呢？非常简单。在敖德萨可以“制造”任何轰动一时的消息。例如，可以在《敖德萨邮报》上发一条新闻，说在工人居住的佩列瑟普郊区，有一条经线断了，只是由于救火队努力奋勇抢救，城市才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这一招就永远也行不通。

但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托列利说。问题在于摆脱饥饿。为此需要至少四个有经验的记者联合起来。应当冒险，然而也许明天我们就可以，用托列利含着柔情的说法，“食用”面包了，也许，甚至会预支给我们一笔钱——每人预支几张“柠檬票”。那时候，票面一百万卢布的苏维埃政权的纸币叫“柠檬票”。

托列利拒绝说明他这个主意的实质，要求对他绝对信任。

“不到时候就宣扬出去，就等于有人用毒眼看了，准会发生不幸！”他坚信不疑地说。



我们对此并不觉得奇怪。现在对我们来说反正一样，完蛋就完蛋，冒险就冒险吧！我们已经饿糊涂了，什么我们都同意。

“那么，”托列利说，“明天我来叫你们，陪你们一起到城里去。”

他戴上一顶圆形草帽——在这以前他一直把草帽放在背后，——含含糊糊地说：“再见，再见！”于是悄悄地走了。

“是——啊，”亚沙·利甫希茨若有所思地说。“‘一切都被强大的飓风刮走了。’什么都卖光了，什么都吃掉了。”

“您说的是什么？”沃洛佳问。

“我说的是，托列利同志的破草帽不是在敖德萨冬天刮北风的时候戴的那种帽子。”

“你们要知道，”沃洛佳说，“他有一个妹妹。一年前，她的腿瘫痪了。她几乎不能走路。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他是多么耐心地照料她啊！在他这可怜的外貌下跳动着的却是一颗舍己为人的心。是一个值得由莎士比亚来写的题材！”

“这个托里切利，他打算玩什么花样呢？”亚沙问。“我们可别陷进一件愚蠢的事情里。”

沃洛佳说，什么都是可能的，然后走了。我们又把大衣拉到头上。但好长时间我也暖和不过来，睡不着。

黎明时我醒了，这时窗外空气微微发蓝，好似用不大干净的群青染过的水，看上去甚至是粗糙的，空气里似乎充满了寒冷的风。显然，这风是直接从北极吹来的。我极其厌恶地想，不久就得起来，到城里去，而风将钻进衣领，冻僵全身。

也许，还是不去吧？在大衣下蜷缩成一团，把身上全部微弱的热气都集中在一起，然后渐渐入睡，犹如从新年枞树上的棉花里，从这热气中抽出一个轻盈的、欢乐的梦——一个蓝色的、精

致的梦，它会留下这样一种温柔的感觉，仿佛用自己的面颊轻轻接触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儿的面颊。

我在等待这样的梦，但梦没有来，却听到北风在花园里恶毒地发出咝咝声。后来这咝咝的风声中又加入了一阵执拗而粗暴的敲门声——这是托列利同志来叫我们了。

我们穿过亚历山大花园到城里去。北风卷起一阵阵沙砾，鞭打着我们的脸，粗糙的灰沙迎面扑来。锌白色的大海从黎明时锌白色的浓雾中滚来了响声震耳的浑浊巨浪。公园里那个小天文台的屋顶上，锌制的风向标一直在讨厌地、纠缠不已地吱吱地响。

“不会有春天，”亚沙说。“也不会有太阳！什么也不会有了！这一切都是还没有消灭干净的知识分子的又一幻想。”

托列利轻轻尖叫了一声，好像呛着似的。我没有立刻猜到他是在笑。在他那被风吹红了的眼睛里，微微发红的泪珠闪闪发光。

“您领我们到哪里去？”亚沙找碴儿似地问。“我预感到这是一场可怜的冒险。”

“我以我的人格起誓，我只是要把你们领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机关那里，”托列利急忙回答。“归根结底，它们总得开始办公，这些机关！顺便说说，你们自己都已经同意去冒险了。”

沃洛佳·戈洛夫钦涅尔在缆索街的拐角上等着我们。

市内空荡荡的。几个骑马的人在缆索街上走过，马蹄嗒嗒地响着，他们的旧羔皮帽上都缝着一小块红布。他们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从所有门洞里都有些小孩子探出头来，院子里立刻传出母亲们响亮的叫喊声：

“回来，你们这些死不了的！真是些祸害，而不是孩子！回